

论汉长安城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的性质

刘振东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)

DOI:10.13619/j.cnki.cn11-1532/k.2025.08.002

汉长安城的西北一隅,历年来发现了不少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迹和遗物,从而成为一个手工业作坊的聚集区。

一 考古发现与研究

汉长安城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内共发现制陶、铸铁和铸钱三类遗址。铸钱遗址位于相家巷村附近,陈直曾到现场考察,并定其为锺官署^[1]。1956年初,俞伟超、赵学谦对该遗址及六村堡制陶(俑)遗址等做了调查,也认为相家巷铸钱遗址是锺官所在^[2]。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,王仲殊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汉长安城做了综合研究,认为东、西市位于城内横门大街的东西两侧^[3],将城内西北部推定为西市。1980年与1985年又有研究者对制陶(俑)遗址进行了调查^[4]。1985~1986年,考古勘探发现东、西二市四周均有夯土墙,其中东市东西约780、南北650~700米,西市东西约550、南北420~480米^[5]。

1987年开始在这一区域做发掘工作,于六

村堡村东北清理1座陶窑(Y1),出土塑衣俑、裸体俑、动物俑等^[6];1990年,在相家巷村南清理21座专门烧造裸体俑的窑址(Y2~Y22)^[7];1991年,在六村堡村东南和相家巷村西南清理5座陶窑(Y23~Y27)和1个灰坑,出土建筑材料、生活器皿和陶俑(塑衣俑、塑衣无臂俑、裸体俑),发掘者认为是民营的私窑^[8]。1998年,在六村堡村东清理6座陶窑(Y43~Y48),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板瓦^[9]。

铸铁遗址的发掘同时进行。1990年,在相家巷村南(第一地点)清理3个废料堆积坑,出土大量叠铸陶范和铁块、铁渣等^[10];1992年,在相距不远的第二地点清理烘范窑3座(Y28~Y30)、炼炉1座和废料堆积坑5个,出土遗物也以叠铸陶范为主^[11];1996年又于第一地点清理烘范窑1座(Y42)^[12]。

铸钱遗址做过两次试掘,一次是1992年在相家巷村东^[13],一次是1997年在相家巷村东北。试掘出土大量陶钱范,但相关作坊遗迹尚未发现。

总之,在手工业作坊区内,制陶遗址分布在西部和中北部,共发掘 33 座,以烧造陶俑、陶动物为主,有的制作建材和器皿;铸铁遗址分布在中南部,包括 1 座炼炉、4 座烘范窑和 8 个废料堆积坑;铸钱遗址分布在东北部,只发现钱范等遗物(图一)^[14]。

笔者认为,汉长安城西北部是专设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,不具备设市(西市)的条件^[15]。白云翔在全面梳理汉长安城手工业遗存的基础上,对西北部为西市的看法提出了质疑^[16];何岁利也认为西市遗址还有待于探寻^[17]。

二 手工业作坊区的性质

上述制陶作坊可能归少府属官东园匠管理,其产品专供以帝、后为主的皇室使用,并用以赏赐诸侯王和列侯;铸铁、铸钱作坊不排除是经过统一规划、专门为皇室生产陵墓用品的可能性^[18]。

毋庸置疑,制陶作坊生产的各种陶俑是用于随葬陵墓的(图二)^[19],其烧造的陶器同样可以作为丧葬用品使用,陵墓随葬器物中最常见的就是陶器。

铸铁作坊的产品,包括圆形轴套、六角承、车害、圆环、带扣、马衔、齿轮、镇、权等,也见于西汉帝王陵墓。帝王陵墓流行随葬实用或模型车马,车马器出土数量较多,此外亦可见到其他器物,如汉文帝霸陵陪葬坑出土有齿轮,汉景帝阳陵南区陪葬坑出土有铁权等^[20]。因此,此处的铸铁作坊也可能归东园匠管理。有研究者认为,该遗址出土陶齿轮范上的“东三”铭与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所见“东三”铭(图三)^[21]是河东郡铁官第三号作坊的省称^[22]。现在从这一区域手工业生产的情况看,陶齿轮范上的“东三”应是“东园匠”第三号作坊的省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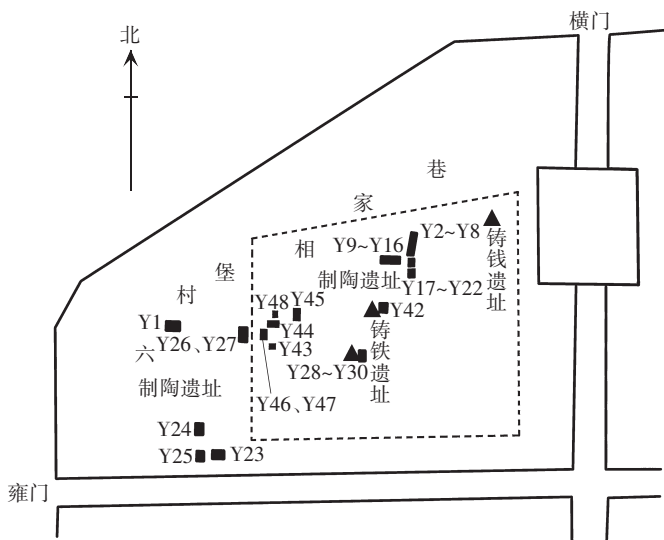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制陶、铸铁作坊隶属于少府属官东园匠,都制作随葬器物,那么与制陶、铸铁作坊同处一个区域的铸钱

作坊属于哪个官署?是否也与制作陵墓用品有关?

相家巷铸钱遗址出土了大量陶钱范,都是五铢钱的正面范模(母范)和背面范,部分正面范模在主浇道两侧制有铭文^[23]。关于该遗址的所属情况,学界有锺官、六厩^[24]和技巧^[25]等几种看法。笔者在 2018 年 12 月于西安举办的“手工业考古·长安论坛——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”上,提出相家巷铸钱遗址应隶属于将作大匠的属官“木工”、此处铸造的钱币用于陵墓随葬的认识。下面对这一认识略做申论。

相家巷出土钱范上的铭文,有“大”字和较多“工”字,为判定铸钱作坊的所属与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“大”字铭单独制于陶范模主浇道左侧,应具有特别含义。研究者多认为“大”为工匠名,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。但工匠名常与“工”字相连,组成“工+名”的形式,如“工可”“工野”“工甲”“工申”“工长寿”“工乘山”等,所以单个“大”字当另有指代,很可能是官署“将作大匠”的省称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砖、板瓦和筒瓦上常见戳印文字“大匠”“大+数字”等,一般认为“大匠”是“将作大匠”的省称,“大”又是“大匠”的省文。陶范模上“大”字也与“工”字同时出现,但“工”字单独制于范模主浇道的右侧(图四)^[26]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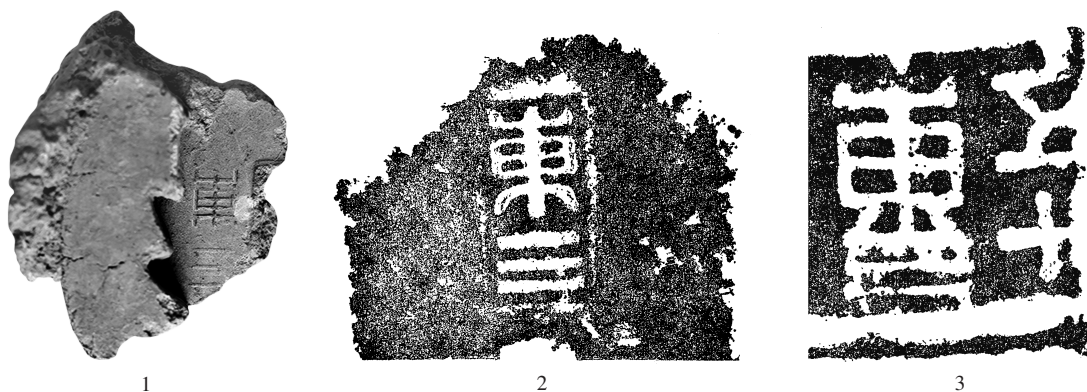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 汉长安城西北部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示意图



图二 汉长安城窑址与西汉帝王陵墓出土裸体陶俑

1. 汉长安城西北部窑址男俑(Y6:1) 2. 汉景帝阳陵东侧陪葬坑女俑 3. 河南商丘永城柿园汉墓女俑(SM1:767)
4. 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女俑(EK7:7) 5. 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女俑



图三 “东三”陶范铭文

1. 汉长安城西北部铸钱遗址陶齿轮范阳文“东三”(92CHT2Y30:16) 2. 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陶铲范阴文“东三”
3. 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釜、碗类容器陶范阴文“东三五升”

这样陶范模浇铸成铜铸范后,“大”“工”分处铸范主浇道的右侧和左侧,“大”代表官署“将作大匠”,“工”代表将作大匠的属官“木工”。

“工”字铭可分为单字“工”、“工+数字”、“第+数字+工”以及“工+工匠名”四种格式。参考“上林三官”之“锤官”“技巧”分别省称为后

一字“官”“巧”的例证,单个“工”字必代表官署名,笔者推断是“木工”的省称。

已发现“工+数字”铭文的有“工一”(图五)、“工二”、“工三”和“工四”,其中“工一”、“工二”和“工三”位于陶范模主浇道左侧,“工四”位于主浇道右侧。参考西安兆伦铸钱遗址出土“官

一”“官二”“官三”及高堡子、低堡子、东柏梁村出土“巧一”“巧二”“巧三”陶范模铭文分别代表铸官和技巧的第一至三号作坊,那么“工+数字”铭显示“木工”至少有四个作坊。

第三种格式“第+数字+工”,仅见“第二工”,有两种书写格式,一种是三字竖排于陶范模主浇道的左侧,另一种是“工”字在陶范模主浇道的左侧,“第二”在主浇道的右侧。此“工”仍代表官署“木工”,“第二”当为编号,“第二工”可能与“工二”所指相同,也可能另有所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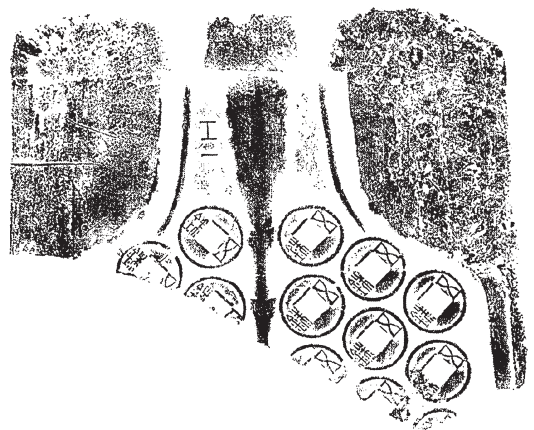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种格式“工+工匠名”之“工”,或指“工匠”,意为工匠某人;或仍指官署“木工”,意为“木工”所辖作坊中的某人。后一种可能性更大。至于铭文中的“申工”、“由工”和“田工”,应解读为“工申”、“工由”(或“工甲”)和“工田”;“工申长寿”意为“工申、长寿”,表示某范模是由名为“申”和“长寿”的两位工匠合作制成,此二人也单独制范,铭文中见有“工申”和“工长寿”。

综上,相家巷铸钱作坊应隶属于省称为“工”的官署,这个官署可推定为将作大匠的属官“木工”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:“将作少府,秦官,掌治宫室,有两丞、左右中候。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。属官有石库、东园主章、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,又主章长丞。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。”^[27]据此记载,该铸钱作坊当设于武帝太初元年或以后,这为认识五铢钱的形制变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分期年限。该遗址出土较多纪年陶范模,目前已知最早的是昭帝元凤元年,最晚的是成帝永始三年;宣帝的年号最多,其中一件铭文为“本始二年十月丁未造十月工”^[28],如果这是一件铭文完整的范模,则表明在宣帝本始年间,该作坊仍属“(木)工”。

相家巷铸钱作坊位于长安城中,显然有别于上林苑内的“上林三官”(铸官、技巧、六厩)。此处作坊设立的契机,推测可能与营建茂陵有关,因为茂陵规模巨大,需要随葬大量钱币。帝王陵墓出土的钱币,例如汉景帝阳陵南区陪葬坑出土的“半两”^[29]和河北满城陵山1号汉墓后室出土的“五铢”^[30],前者尚未修整、打磨,后者



图四 相家巷铸钱遗址“大”“工”铭钱范模
(97CH 西市 T4: 2)



图五 “工一”铭钱范模
(《中国钱币》2005年第2期)

无使用磨损痕迹,它们应出自专门为陵墓制作钱币的作坊。从遗址出土的纪年范模看,铸钱活动在宣帝时达到鼎盛。葬于宣帝时的海昏侯刘贺,墓中随葬有200万枚五铢钱,可见帝王丧葬用币数量之大。铸钱作坊的盛衰,也与帝陵随葬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。《汉书·成帝纪》:“乙未,有司言:‘乘舆车、牛马、禽兽皆非礼,不宜以葬。’奏可。”^[31]元帝葬,不用车马禽兽等物,减少的陵墓随葬器物应包括钱币一项。相家巷铸钱作坊到元帝、成帝时渐趋衰落,哀帝、平帝时可能仍用旧铸范延续生产。

一般认为,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是在武帝元鼎四年。西安兆伦铸钱作坊属铸官,一直沿用到新莽时期;汉长安城以西高堡子、低堡子、东

柏梁村出土带“巧”字铭的陶范模,说明这一带是武帝太初元年营造建章宫之前的“技巧”铸钱作坊所在^[32]。建章宫营建后,“技巧”作坊应就近移往他处,因该铸钱遗址分布范围很广,包括北沙口村等地,加之建章宫遗址的范围尚未厘清,所以“技巧”作坊移往何处,尚难确定。至于相家巷铸钱遗址存在个别“巧”字铭砖和陶范模,建章宫遗址区或出土有相家巷铸钱遗址常见的“工”“可”铭陶范模^[33],应是这两处铸钱作坊相距较近,工匠或陶范模在作坊间流动所致。这种范模或铸范在异地间流动、使用的情况,也见于西汉地方铁官,例如在属于鲁国的薛城内出土了远在百公里外山阳郡(“山阳二”铭文)的铸范^[34]。因此,在某作坊发现相距较近或很远的同类作坊的范模、铸范或其他物品,实在情理之中。

三 小 结

总之,汉长安城雍门大街以北、横门大街以西的西北一隅,是专为制作陵墓用品而设的手工业作坊区,其西部、中北部的制陶作坊与中南部的铸铁作坊连成一片,隶属于少府属官东园匠,东北部的铸钱作坊隶属于将作大匠的属官木工。东园匠“主作陵内器物者也”^[35]，“东园秘器”“东园温明”等高等级葬具,都应在东园匠所辖作坊内制作。将作大匠与陵墓修造亦关系密切,“《汉旧仪》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:‘天子即位明年,将作大匠营陵地’”^[36]。特别是将作大匠的属官东园主章,“东园主章掌大材,以供东园大匠也”^[37],说明少府属官东园匠与将作大匠属官东园主章(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木工)不仅都参与帝王陵墓的营建,而且之间还存在合作关系。这可能也是两官署皆名“东园”,其所辖作坊位于同一区域的原因所在。

顺便提及,汉长安城遗址出土板瓦、筒瓦上有一类“工”字铭戳印,主要格式是“工+数字”,此“工”不排除也是将作大匠属官“木工”简称的可能性。这些制陶作坊生产的砖瓦,除了用于陵墓建筑,同样可以用到城市建筑上,因为将作大匠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掌治宫室第宅。

附记:感谢白云翔、曹龙、段毅、闫华军在本文选题、资料收集等方面的提示和帮助。

- [1] 陈直《石渠阁王莽钱的背面范》,《考古通讯》1955年第2期。
- [2] 俞伟超《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》,《考古通讯》1956年第5期。
- [3] 王仲殊《西汉的都城(长安)》,《汉代考古学概说》,中华书局,1984年。此书的英文版于1982年5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- [4] 毕初《汉长安城遗址发现裸体陶俑》,《文物》1985年第4期;周苏平、王子今《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》,《文博》1985年第3期。
- [5] 刘庆柱《西安市汉长安城东市和西市遗址》,《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7》,文物出版社,1988年。
- [6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《汉长安城1号窑址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1年第1期。
- [7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《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4年第1期。
- [8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《汉长安城23~27号窑址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4年第11期。
- [9] 刘振东《汉长安城新发现六座窑址》,《考古》2002年第11期。
- [10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《1996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7年第7期。
- [11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《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5年第9期。
- [12] 同[10]。
- [13] 李毓芳《汉长安城烘范窑和铸币遗址》,《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3》,文物出版社,1995年。
- [14] 白云翔《汉长安城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学研究》,《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——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科学出版社,2008年。本图据此文图二制作。
- [15] 刘振东《汉都长安的手工业与市》,《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》,科学出版社,2010年;《关于“长安市”》,《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》(第三辑),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6年。
- [16] 同[14]。
- [17] 何岁利《汉唐长安城市场探析》,《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——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科学出版社,2008年。
- [18] 刘振东《汉都长安的手工业与市》,《西汉南越国

- 考古与汉文化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[19] 图二：1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发掘资料；图二：2见汉景帝阳陵博物院《巍乎盛景——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基本陈列》，54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20年；图二：3见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《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》，图版三七：1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；图二：4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《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13年第5期；图二：5现存汉景帝阳陵博物院，图片由该院闫华军提供。
- [20]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《汉阳陵》，120页，重庆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[21] 图三：1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《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95年第9期；图三：2、3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《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试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94年第8期。
- [22] 李京华《对汉长安城冶铸遗址的简报谈几点意见》，《华夏考古》1997年第4期。
- [23] 陈直《西汉铸钱铜材和钱范的发现》，《西北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57年第1期；党顺民、赵晓明《西安相家巷村新出西汉“五铢”钱陶范母调查研究》，《中国钱币》2005年第2期；党顺民《从西汉建章宫遗址及附近出土钱范探讨五铢钱的演变》，《陕西金融》1989年增刊（钱币专辑12）。
- [24] 吴镇烽《再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》，《中国钱币》1999年第1期。
- [25] 徐龙国《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》，《考古》2020年第10期。
- [26] 徐龙国《西汉上林三官铭文范模研究》，《考古》2021年第12期。
- [27] 《汉书》卷一九《百官公卿表》，第733页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。
- [28] 王泰初《西汉上林五铢钱陶范收藏断代举要》，《收藏界》2007年第4期。
- [29]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《中国汉阳陵彩俑》，110页，陕西旅游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[30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《满城汉墓发掘报告》（上），207页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。
- [31] 《汉书》卷一〇《成帝纪》，第302页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。
- [32] 同[24]。
- [33] 徐平《西安发现“五铢”陶母范》，《中国钱币》1989年第1期。
- [34] 李京华《汉代铁农器铭文试释》，《考古》1974年第1期。
- [35] 《汉书》卷一九《百官公卿表》颜注，第732页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。
- [36] 《后汉书》志第六《礼仪下》注，第3144页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。
- [37] 同[35]，第734页。

（实习编辑：崔 焱）